

日本侵緬之戰（1940-42）與臺灣的角色*

蕭明禮** 朱泓源***

摘要

本文以日本為侵略緬甸，而動用情報機構在臺灣殖民地訓練該國反英份子游擊作戰，以引領日軍入境為主軸，透過考證與調查，探討二次大戰初期日本對東南亞地緣政治中之臺灣因素。文中追述臺灣軍訓練緬甸三十志士（the Thirty Comrades）謀略戰多方面能力的細節，其次發掘了日人扶植之「緬甸獨立軍（Burmese Independence Army, BIA）」參與仁安羌之役的線索。尤其是後者，儘管現存的日軍師團級參戰報告中有關緬甸獨立軍的內容模糊，但透過日軍基層部隊的紀錄、國軍與英軍史料的多方比對，釐清了多年來緬甸獨立軍是否參戰的爭議，以及日軍刻意淡化緬甸獨立軍在此役作用的真相。

全文看到日軍利用臺灣殖民地在對南中國以及東南亞的侵略上，扮演若干不可或缺角色。

關鍵字：二戰、臺灣、緬甸獨立軍（BIA）、南機關、仁安羌戰役

* 本文資料收集與撰寫期間，承蒙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研究中心戰史研究室長立川京一、日本軍事史學會顧問兼防衛研究所調查員原剛、北海道大學教授岩谷將、防衛研究所戰史研究中心戰史研究室研究員藤井元博、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總合學術院講師島田大輔等日方人士，以及英國國家學術院 Robert Lyman 院士、美國國務院前編譯姚敏芝、我國國防大學前副校長張鑄勳中將、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前局長傅應川中將、陸軍軍官學校政治系前講師楊力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博士後研究員平山光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經理張智傑、花蓮玉里文史工作者陳世淵、緬甸華僑亞東醫院陳學文醫師與林天順先生等各界人士鼎力協助，並蒙諸位匿名審查人與相關人士指正甚多，在此謹併申謝悃。

** 日本武藏野大學全球研究學系兼任講師。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一、前言

臺灣位處西太平洋的樞紐地帶，但關於歷史上的臺灣與東南亞間互動關係的研究卻多集中於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陳慈玉，1997；中村孝志，2002；梁華璜，2003；鍾淑敏，2004；葉碧苓，2010），少從國防戰略切入（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2013）。事實上，日治時期的臺灣對東南亞產生的影響力相當複雜而多元。本研究團隊在過去數年運用中、英、日文史料，特別是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資料中心的檔案，完成 1942 年日軍入侵緬甸的前因後果，探討日軍發動緬甸戰役背後的東南亞地緣戰略考量、臺灣在此其中扮演之角色。此外，亦以著名的仁安羌戰役為對象，釐清諸多相關論著未能解決的疑問，進一步深入分析臺灣訓練緬甸「三十志士」的故事，並解決中外學界爭議多年的仁安羌戰役參戰日軍與中英雙方紀錄有所落差之問題（朱浚源、蕭明禮、姚敏芝，2015；朱浚源、蕭明禮、楊力明、林天順，2017）。

步兵中將張鑄勳為仁安羌戰役研究者中之翹楚，尤其〈仁安羌大捷戰場巡禮——國軍第一一三團揚譽國際的作戰〉（張鑄勳，2015: 305-346）一文最稱專業，文中詳論渠本人親自到達現場考察，以及作為步兵將領心得，將其與英將史林姆（William Slim）的經典名著（Slim, 1956）詳加比對。此文恰足以匡正大陸民間史家盧潔峰的前後兩部引發爭議之著作（盧潔峰，2013, 2015）。

盧潔峰批評劉放吾團長當年的《第一次：燕南羌戰鬥詳報》，發現有：「真實信息」與「虛假謊言」參雜，非常坦率合理，且鞭闢入裡（盧潔峰，2015: 147-150）。極有啟發性，見樹枝精微，無出其右者（對戰役投入中、英、日、美四國軍隊之指揮官的重要史料，非常詳細爬梳），但因尚不見林（尚未注及緬甸、東南亞以及整個世界戰場的大環境），因而留給本團隊的十多名成員進一步討論的空間，並在本文中由筆者兩人代表，呈現最新之發現與結論。

簡言之，盧潔峰所指責者為：113 團號稱編制雖有 1,121 人編制，但參與實戰者恐怕最多也只有其中七、八百人；而該團陣亡 250 人，卻能殲滅人數高達 1,300 人的日軍，有過於誇大之虞（王文燮，2015: 767），的確相當科學，而且正是爭議的關鍵點。只不過，歷史的變數，遠比科學所合理推斷的變數更多，因此更複雜。

本團隊經過五年以上鍥而不捨地追蹤，有了重要的切入新管道，因此發現劉團長（與孫立人師長）等人於戰鬥剛結束的現場紀錄，加上立即向負責監軍長官的報告，應有其根據。本研究的報告根據，則來自：（一）緬甸本身以及（二）日軍基層部隊報告，甚至於（三）臺灣若干現場的多種建築、直接紀錄、照片、間接回憶等證據。這些資料都指出十分令人意外、新而深刻的內涵，從而凸顯戰場變數之多的實況，也因此得到超越盧潔峰想像的具體發現。其詳細內容，就是本團隊探索以及要討論的主體。

二、日本對滇緬公路的重視

（一）滇緬公路的興築背景與通車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隨著戰事轉入持久僵局，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而言，如何維持對外交通，取得長期抗戰所需軍民物資以維繫國家民族命脈於不墜，成為重要的戰略目標。相對地，就大日本帝國來說，要如何阻斷中國對外交通管道、迫使國民政府屈服，也就成了為盡快結束深陷泥淖的「支那事變」所必須的戰略考量之一。事實上，中國重要的沿海口岸，大多於 1939 年之前便已陸續淪入日本之手。雖有少數幾處沿海及內河港口尚可透過英屬香港或上海租界的轉口貿易，勉強維持中國大後方與海外之貿易，取得中國所需之抗戰物資。但整體來說杯水車薪，且這種透過第三國船隻往來於中立港口、淪陷區與國府控制區的貿易模式，仍受到擁有優勢海權實力的日方盤查封鎖（蕭明禮，2017）。

不過，國民政府早已預知，故在中日戰爭爆發前即有利用西南地區陸上交通線維持國際交通的方案，除了既有通往法屬中南半島的滇越鐵路之外，最重要者就是抗戰爆發後的 1937 年底動工，並於 1938 年 7 月初步通車之滇緬公路（李君山，2012: 65-68）。

（二）日方對滇緬公路的情報收集

滇越鐵路的運作及滇緬公路的通車，一定程度抵消了日方封鎖中國沿海口岸的功效，更讓日本深感芒刺在背，其封鎖戰略無法達成迫使國府屈服的戰略目標。因此日方收集大量有關滇緬公路與滇越鐵路之情報，密切觀察中國西南與中南半島陸上交通線的運量、運輸物資種類、運輸

體系的組成。對西南地區中國抗戰生命線的重視，可從日軍大本營陸軍部的戰時機密日記窺見一二。

首先，以滇越鐵路為例。1939 年 4 月，外務省轉傳給陸軍省一份日本駐河內總領事關於海防與中國國民政府之間貿易概況的機密報告，顯示 1939 年 3 月由海防經滇越鐵路或其他路線運抵中國的物資達 10,794 噸，高於中國向法屬中南半島輸出的 5,343 噸（澤田廉三，1939）。

其次，滇緬公路部分，以日本駐仰光領事久我成美於 1939 年 5 月傳回外務省的極機密報告：〈關於抵達緬甸之中國進口武器第二次中間報告〉（日文標題為：緬甸ニ到著セル支那向武器ニ關スル第二中間報告）為例。詳盡記錄了開抵緬甸的武器運輸船數量、經滇緬公路運回中國大後方的武器數量、通過之卡車種類數量統計等。例如，從 1939 年 2 月底至 5 月底，援華武器物資開抵仰光港的外籍輪船共 68 艘，其中又以英國籍輪船為大宗（表 1）。至於卸載的物資，共有 1,847 輛卡車、122,800 箱彈藥、2,808 箱火藥、250 箱壓路機等各式築路機具、251 箱飛機零件、890 噸鐵軌運抵仰光（久我成美，1939）。

表 1、抵達仰光之援華武器運輸船表

國籍	艘數
英國	49
挪威	7
美國	6
德國	4
瑞士	2
合計	68

資料來源：久我成美（1939）。

說明：1939 年 2 月 21 日至 5 月 20 日。

再者，值得注意的是，相較 1939 年 2 月之前的階段僅進口 126 輛卡車，當年 2 月底至 5 月底的三個月期間，運抵仰光的卡車遠超過前一階

段。而這些卡車運抵仰光後，先交當地周邊由華人營運的小型組裝工廠重新組裝，再運上火車開往中緬邊界的臘戍。據日方統計，光是 5 月 20 日前，至少就有 500 輛卡車抵達當地，尤其是 5 月上旬之後，仰光方面卡車組裝的速度增加，據稱一天最多可組裝 20-40 輛卡車。而日方亦注意到這些運抵緬甸的卡車型式逐漸大型化，包括美造「道奇」（Dodge）卡車在內的大型、堅固車種。這些卡車多半直接開往中國西南大後方，僅有少數用於滇緬公路武器運輸。1939 年初，負責西南地區交通運輸，並成為滇緬公路西段（臘戍至中緬國境）經營中國政府物資運輸的「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總經理處」（即「西南運輸處」之簡稱，並對外宣稱為「西南運輸公司」），將臘戍至中緬國境段的部分汽車運輸業務轉包給洋商維得尼斯（S. Vertannes）公司負責（李君山，2012: 70）。日方的報告中也提及行駛滇緬公路的卡車中，包括了仰光汽車業者瓦特森（日文檔案稱「ワトソン」）商會（Watson & Co.）及亞美尼亞商人「バタンネ」（S. Vertannes）所有的卡車在內（久我成美，1939）。

日方對緬境臘戍到中緬邊界間的運輸情況特別注意。報告中稱從 4 月上旬起，該路段幾乎每天或每隔一天有 1 至 3 隊（每隊 25 輛）由載重 1 噸半至 3 噸卡車（多為美製雪佛蘭、福特卡車）通行，而且每天對開 10 班次左右（久我成美，1939），可見運輸頻繁。

最後，日方甚至連行經滇緬公路的中方重要人物姓名、日期、赴緬目的與活動等相關情報均有所掌握。其中除了擔任西南運輸處處長的宋子良之外，連時任國府交通部長的張嘉璈、作為政治家與思想家的仲兄張君勱等人赴緬的活動日期、目的等，均被探悉（久我成美，1939）。這也反映當時日方緬甸情蒐的深入。

要之，雖然近年有研究從負面的角度認為滇緬公路因路況、設備不佳，加上中緬雙方管理不良、推諉責任，以及倉儲凌亂等因素，使其運輸能量不如預期（李君山，2012: 83-85）；但從以上情報來看，日本對滇緬公路的存在相當忌憚。

（三）日軍滇緬公路阻斷戰略的萌芽

隨著國際局勢變化，中國西南地區聯外交通線，都受到威脅。1939 年 9 月，歐戰爆發。次年 6 月，德國以閃電作戰迅速佔領法國本土，法

國投降。日方趁此良機，當月下旬即施壓法屬中南半島政府，切斷滇越鐵路，8 月又迫使法屬政府允許日軍進駐北越。另一方面，在 7 月中也施壓英方，使封鎖滇緬公路（李君山，2012: 72），雖然 3 個月後滇緬公路又重獲開放。

1941 年春天，日本又透過簽訂〈日法議定書〉、《日本法屬中南半島經濟協定》，調解法屬中南半島政府與泰國簽訂《法泰和平條約》（Convention of Peace between Thailand and France，又稱《東京條約》）等方式，擴大其在中南半島的政經地位並試圖強化對泰國的影響力，取得由陸路威脅滇緬公路的有利跳板。¹中國西北方面，另外一條國際交通線：由新疆直通俄屬中亞的路線，也因當年 6 月德國進攻蘇聯，導致援華物資量銳減。以上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對外陸上的三條主要國際交通線，在 1941 年夏天只剩下滇緬公路（Allen, 2000: 18）。因此，要如何鎖死最後這一條路，以完全堵死中國，就成了日本當務之急。

然而，讓日本感到棘手的是，正因為遠東國際局勢的日益緊張，英美逐步走向聯合中國對抗日本擴張的方向，不僅讓更多物資源源不絕地湧入緬甸與滇緬公路，也讓日軍意識到，若要徹底切斷滇緬公路，很有可能必須要與緬甸的殖民母國—英國直接衝突。特別是在 1940 至 1941 年之交，儘管日英關係漸趨惡化，但日本尚未確立對英美開戰的方針。若要破壞滇緬公路交通，勢必得藉用緬甸當地反英勢力，以達成制服中國的目標。為此，日本要利用的地點不只一處，除了緬甸當地外，還包括泰國、越南、剛被日軍佔領的海南島，以及殖民多年的臺灣（朱宏源、蕭明禮、姚敏芝，2015: 296）。

為了壓制中國抗戰，必須摧毀滇緬公路，臺灣竟因此與緬甸緊密結合。而當年為尋求武裝以脫離英國統治的緬甸菁英群，其對抗華軍的戰術武器使用、情報收集與破壞謀略之訓練與戰略能力的養成教育，竟與也是華人居住地的臺灣脫離不了關係。

¹ 本文所稱之〈日法議定書〉日文全名為〈保障及政治的了解ニ關スル日本國『フランス』國間議定書〉。至於《日本與法屬中南半島經濟協定》（《日・仏印經濟協定》）其實為一連串條約與協定文本之通稱，包括《佛領印度支那ニ關スル日佛居住航海條約》、《日本國印度支那間關稅制度、貿易及其ノ決濟ノ様式ニ關スル協定》及其他不公開之議定書與換文等（王文隆，2019: 10；立川京一，1999: 44）。

三、「南機關」在臺灣

（一）日本的戰略目標、策略運用與南機關之成立

為了切斷重慶當局經由法屬中南半島及緬甸之補給，日軍必須切斷滇緬公路，但由中國境內以武力封鎖幾乎不可能（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1997:12）。如何切斷？則是其參謀本部之策略運用上的一大考驗。令世人注意的，是日本竟有辦法，透過情報收集，建立各種情治系統，來達到這個目的。日方除了運用「滿州國」、臺灣與朝鮮殖民地，新征服地廣東與海南島之外，甚至連汪精衛政權與東南亞之間的關係網絡，也加以利用（陳中和，2013:37-39）。但最重要的手段，自以結合緬甸菁英，使動員緬甸社會，在當地直接推倒英政府、擊敗英軍最為上策。

早從1940年3月，日軍參謀本部所屬鈴木敬司大佐，即奉命執行阻斷滇緬公路戰略，從研究、布局、組織、籌款，特別是人員的養成，包含從精神教育、體能、武器使用、情報作業到謀略性破壞的訓練在內（Bo Min Khaung, 1968: 7-8）。鈴木大佐有鑒於自十九世紀末緬甸成為英國殖民地以來，緬甸人的反英運動此起彼落；尤其是1930年代後由於世界經濟大恐慌影響，緬甸農村經濟凋敝，導致農村暴動再度激化（何敏，1979: 212-213），也激起了緬甸民間反對英國統治的聲浪，故有意利用緬甸當地勢力擾亂滇緬公路運作（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1997: 12）。

其中，為鈴木所看重者，即為主張以武力復國的「德欽黨」（Thakins）。²他認為要執行阻斷戰略，這群菁英是最理想的一股力量：

如果發展緬甸的民族運動，特別是德欽黨為中心的激進勢力將來武裝暴動的話，將可透過彼等實現我方切斷滇緬公路之目的（中野校友會，1978: 352）。

為此，鈴木敬司於6月間化名「南益世」，以《讀賣新聞》代表身份，抵達仰光展開實地考察，除了調查滇緬公路的現況之外（中野校友會，1978: 352；畠山清行，1967: 182），更探察緬甸政治風向，評量如何

² 「德欽」，照緬語意思，「We Burmans」是「主人」或「老爺」，表示緬人要當家作主，不再為英人的奴隸的意思（何敏，1979: 214）。

為日本所用，來切斷滇緬路（Allen, 2000: 17-22）。鈴木潛入緬甸期間，接觸了時任英屬緬甸政府擔任教育部長的鄧猛博士（Dr. Thain Maung），以及德欽米亞（Thakhin Mya）為首的德欽黨激進派等各方人士。極其真切渴望尋求獨立的他們，希望日本能提供必要的武器及對年輕德欽黨人的軍事訓練（中野校友會，1978: 352）。

就在此時，英國人亦極力打壓德欽黨，並逮捕緬甸前總理巴莫等人。迫使當時擔任德欽黨書記長的翁山（Aung San）與另一名德欽黨人延昂（Bo Yan Aung，日文為ラミヤン）搭乘挪威籍貨輪海利號偷渡至廈門。³此舉為鈴木大佐於 9 月下旬獲悉，立即採取行動，要求臺灣軍一方面出動所屬憲兵部隊在中國東南沿海口岸搜尋翁山與延昂兩人，二方面亦將其要求與翁山的相關資料轉送至廈門特務機關展開搜索（Bo Min Khaung, 1968: 8）。1940 年 11 月上旬，廈門憲兵隊在鼓浪嶼的小客棧找到兩人。

為日軍所收容的翁山等人，隨即轉經臺北，於 8 日抵達東京羽田機場。⁴翁山一行抵達日本，不僅正式轉變了翁山的命運，也讓鈴木有機會向日軍大本營證明直接介入緬甸事務的極大可行性（Allen, 2000: 19）。

鈴木敬司赴緬活動、極力接觸翁山並將之接赴日本的一系列行動，也與臺灣當地的日本企業有關。據日本特務機構「中野學校」成員於戰後編纂的校史顯示，臺灣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社長岡田幸三郎曾提供鈴木資金援助，使能有效地在各地活動。⁵這項隱微史實，也反映臺灣在 1930

³ 此處出自緬甸國軍事顧問部（ビルマ軍事顧問部）於 1944 年編纂之《南機関外史》（緬甸國軍事顧問部，1944: 120）。該書原為手寫本，並於昭和 37 年由楠田胤成贈於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史料研究中心史料閱覽室。

⁴ 據上述 *Bogyoke Aung San and Thirty Comrades* 一書所稱：廈門憲兵隊發現翁山與延昂後，兩人先被「送到臺灣，再從臺灣到橫濱。」最後於 1940 年 11 月 12 日抵達東京（Bo Min Khaung, 1968: 10）。

⁵ 岡田幸三郎（1888-1972）。1909 年長崎高等商業學校畢業。其後進入鹽水港製糖會社，並於 1939 年就任該社社長。其女順子（嫁與日本名作家遠藤周作）曾將父親與南機關、緬甸獨立份子的往來事蹟撰寫成書，以《ビルマ独立に命をかけた男たち》之名出版。此外，早在岡田接任鹽水港製糖社長之前，該社便已和泰國有相當程度的業務往來。1910 年，鹽水港製糖藉爪哇糖價大漲的機會，將臺灣蔗糖出口至當時名為暹羅的泰國。1935 年，由於日本勢力範圍內砂糖過剩，鹽水港製糖又派員赴泰國考察，結果認為應進一步擴大對泰國製糖業的技術或資本援助。因此，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前，鹽水港製糖即已在泰國有一定的基礎。是故，後來鈴木敬司等日本軍人準備進入泰國活動時，還得仰賴當地的鹽水港製糖會社相關人士協助（中野校友會，1978: 354；橫田武郎，1936: 2-3、96-97；河林原直人，2009: 169；遠藤順子，2003）。

年代末期開始成為日本南進跳板後，在臺日本企業家與軍部合作，試圖擴大對東南亞影響力的事實。

1941年2月1日，由鈴木敬司所主管的「南機關（Minami Kikan, 意即「南方機關」）」，在陸海軍兩部的協同合作下於東京正式成立（緬甸国軍事顧問部，1944: 8-9）。根據海陸兩軍總長所認可的南機關計劃大綱，該組織的設立目標即為「提供武器及幹部要員的軍事訓練，並進一步透過直接指導的方式助長緬甸獨立運動以發展武裝起義、促使英國統治權力的崩潰」（中野校友會，1978: 355）。此外，除臺灣的岡田幸三郎以外，南機關也獲得上海特務機關的樋口猛、興亞院的杉井滿等人的大力援助（中野校友會，1978: 352）。

南機關成立的首要目標就是掩護翁山等人潛回緬甸，以連繫德欽黨等當地的反英勢力，並將緬甸反英份子接出境外，帶往日本勢力範圍接受訓練（緬甸国軍事顧問部，1944: 10-12）。為此，南機關在東京成立後不久，於1941年3月初以「南方企業調查會」名義之掩護，將總部遷移至泰國曼谷作為行動中心，並在泰緬邊境的四座小城清邁、來興（Rahaeng），北碧（Kanburi）和拉廊（Ranaung）以商業活動為掩護，建立分部。這些小城經過精心挑選，做為日後日軍入緬的前哨站；而各分部首腦的任務，就是在適當的掩護下進行與緬甸德欽黨人聯絡、收容以及收集當地的地形地貌情報等。⁶

同時，除了日本本土與泰國，臺灣也有南機關的密訓與轉運「三十志士」的據點。據日軍於1944年編纂、可視為該組織唯一官方正史的《南機關外史》顯示，南機關於1941年2月成立後不久，就派遣了所屬士官（日文軍語之「軍曹」）至臺灣軍司令部內設置聯絡處（緬甸国軍事顧問部，1944: 12-13。）。同時亦準備於海南島三亞設置緬甸反英份子的訓練所，以及在廣東設置武器接收班等（泉谷達郎，1989: 49）。

⁶ 另外，在《南機關外史》中亦提及在曼谷的南機關泰國班（1941年7月隨南機關改組成立）中有一姓米田之臺灣人，專門負責中文報紙、文件的翻譯，以及搜集華人相關情報。由此也顯示了日軍對緬情報作戰中，亦有臺灣人參與的事實（緬甸国軍事顧問部，1944: 17-20）。

（二）訓練機構之設置與移師臺灣

1. 三亞、玉里密訓與臺北兵推

原本南機關設立之初，預定分別在臺灣與海南島設置訓練所。但鑑於保密與避免造成外交事件等因素，訓練所先設在海南島，並由三亞的海軍部隊負責興建各類設施（泉谷達郎，1989: 61）。從 1941 年春天到 8 月間，在南機關的協助下，共糾集了 30 名緬甸反英份子成為日本培育反英武裝勢力的骨幹。這批日後被緬甸人稱為「三十志士」的受訓者，在 1941 年 4 月底到 9 月間，先後抵達海南島，接受各種基本教練，接著在當年 10 月之後陸續移防臺灣，在花蓮玉里接受高層次的兵器與謀略訓練。⁷在海南島訓練階段，反英份子接受的訓練包括了：游擊戰、圖上作戰演練、實彈射擊，以及利用擄獲的國軍武器學習如何操作非日造武器裝備，以圖在發動武裝叛變時，規避英方耳目（其實是戰術性的混淆敵軍視聽）等（泉谷達郎，1989: 64）。

1941 年 8 月，隨著日本與英美關係日益緊張，南機關於當月 20 日在臺北北投的某間溫泉旅館召開會議，商討當日軍發動東南亞作戰時，該機關人員潛入緬甸的時機與方法。⁸經協調後，鈴木敬司跟緬甸人約定儘早實施緬甸潛入計劃，並決定為便於後續作戰進行，南機關將以獲得日軍一個旅團的支援下，於日軍主力開始緬甸作戰之前先佔領緬甸南部的計劃作為日後作戰方針（泉谷達郎，1989: 75）。

9 月，大本營假東京九段的偕行社（陸軍俱樂部）實施緬甸工作兵棋推演，檢討工作實施的可能性。南機關長的鈴木大佐身兼統裁官與藍軍司令官，紅軍司令官則為結束滇緬公路監視團長任務的渡邊三郎海軍大佐充任。演習不以正規的緬甸進攻作戰為前提，而是基於南機關的構想，以自力展開敵後工作的方式進行。結論是雖然緬甸東部山區有獲得解放

⁷ 日治時期的臺灣的軍事指揮中心—「臺灣軍」司令部，位於臺北市三線道書院町（今屬中正區建國里），佔地有七千兩百餘坪，包括軍事幕僚、武器、經理、軍醫、獸醫、法務等各部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國民政府軍隊接收，並改為警備總司令部，該司令部裁撤後，曾經改為海岸巡防司令部，後改編為海岸巡防署，其後巡防署遷至臺北市文山區，該址後來改為軍管區司令部及國防部並延用至今（eTaiwan, 2011）。

⁸ 在這場會議之後的 9 月上旬，機關長率領川島大尉、翁山、拉佩等緬甸獨立分子領導者前往東京，在九段偕行社跟參謀本部人員與軍令部列席者一同舉行地圖演習（泉谷達郎，1989: 75）。

的可能，但為了確保解放區的重要地帶，有動用部分日軍部隊（混成旅團規模）的必要。⁹

繼兵棋推演之後，南機關於 9 月底下令關閉海南島的三亞訓練所，全軍移師臺灣。移防臺灣的理由，除了在保防上繼續待在三亞，日軍訓練緬甸武裝分子的事實恐將曝光，以及為提高其未來領導緬人獨立革命的軍事行動時，能夠有足夠的知識與技能，故需要在臺灣接受更高階的政軍訓練之外，另一個重要考量則是日後前進的較具便利性。因此，南機關於 1941 年 9 月，在玉里成立「臺灣玉里緬甸獨立義勇軍幹部訓練所」（緬甸國軍事顧問部，1944: 97）。更機密的謀略戰法訓練，則在臺北市乃木町¹⁰偕行社內的乃木館（昔年乃木希典總督的官邸）進行。¹¹

2. 玉里集訓

10 月 5 日，三亞訓練所關閉，部隊經榆林港前往臺灣。¹²8 日，一行於臺灣東海岸的花蓮港上岸，搭乘火車至玉里（花蓮港廳的玉里町，泉谷達郎，1989: 78），再進入山區的玉里訓練所。¹³充作緬甸反英武裝分子訓練所的營區是前日軍警備隊舊址，事實上遠在明治末年，為了東西監視通往阿里山的主要道路，日軍就曾在原名「璞石閣」的玉里駐紮了名為「璞石閣分遣中隊」的陸軍守備部隊（後來經數次改組成為玉里分屯中隊）。因為這層關係，留下了足以容納一個中隊¹⁴（連級規模部隊）的舊營房。¹⁵到了 1930 年代，有鑑於玉里當地為八通關警備道東段終點（即戰後籌建的「新中橫公路」東端出口，今臺三十號省道路段），以及

⁹ 當然，緬甸戰役實際發動後，日軍投入的兵力規模遠超於此（中野校友會，1978: 359）。

¹⁰ 乃木町為日治時期臺北市之行政區，為紀念乃木希典總督而命名。在文武町之西，共分一～三丁目，今延平南路、中華路、長沙街一段、貴陽街一段之一部均在町內（記憶・臺北，2007）。

¹¹ 此建築原為清代劉銘傳設置之西學堂，日本殖民臺灣初期曾作為總督官邸，因第三任臺灣總督乃木希典居住時間最長，故稱為乃木館。位置在今日的寶慶路、桃源街、長沙街跟延平南路所圍起來的街廓裡，約略長沙街一段國軍英雄館與國史館之間，即原婦聯總會內（蘇芷萱，2008: 144-145）。

¹² 《南機閩外史》紀錄：10 月底「志士」一行及教官經高雄，繞行東海岸移防玉里。根據此說，應係行經南迴公路。惟以各種紀錄資料相互衝突，故其在臺受訓及活動詳情仍待追查（緬甸國軍事顧問部，1944: 54）。

¹³ 另一說稱該部於 1941 年 10 月 15 日從海南島 三亞（San-Nga）轉到臺灣花蓮的玉里（Tamasato）（Bo Min Khaung, 1968: 164）。

¹⁴ 1909 年為了監視防備附近原住民，日軍在玉里部署步兵分屯中隊。

¹⁵ 請見璞石閣（2017、2020）。

設有一座火力發電廠之故，¹⁶因此玉里分屯中隊之編制較一般日軍中隊為大，約有一兩百人、相當於國軍加強連的兵力。

惟據本文作者之一¹⁷於 2017 年的兩度田野調查顯示，當地耆老稱發電廠附近於 1944 年時已設有一座主官為少佐編階的訓練中心，¹⁸顯見玉里當地的日軍營區在位階、層次、任務、功能與重要性上的特殊，故其在日軍軍制上應有的待遇與地位均較高（戰後，國府接收玉里之日軍設施，原玉里分屯中隊舊址成為今天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當緬甸武裝分子抵達玉里後，雖曾受到鎮民盛大的歡迎，以鼓舞其士氣，但為高度保密，日軍限制渠等進入玉里鎮內。此外，外出時又偽裝成臺灣軍候補士官隊（軍官候補生）的模樣，¹⁹軍服上並掛上了日軍兵長的階級章。²⁰

在臺灣約兩個月的時間裡，受南機關節制的緬甸反英份子，接受的訓練以混淆盟軍之變裝、²¹中式武器使用、情報蒐集、以及交通破壞、電訊干擾等科技戰術，²²及熟悉日軍制式武器的使用，後者包括了戰鬥射擊為主的實彈射擊，以期訓練程度的提升，並加上實際指揮部隊的演練（中野校友會，1978: 359）。所使用的武器以日造為主，其中還包括了平射砲與曲射火砲在內的重型兵器（泉谷達郎，1989: 80）。

（三）南機關入泰部署與改隸南方軍

名義上「三十志士」來臺受訓的時間約兩個月，但在他們抵達臺灣約十天左右，就已經有部分成員離開臺灣，先行前往泰緬邊境，準備進

¹⁶ 即 1920 年設立之玉里火力發電所（44 年停止運轉）（臺灣電廠百年文史地圖，2018）。

¹⁷ 藉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研究專題中心協助提供昔年美軍空照圖，朱泓源與楊力明、林天順兩度抵達玉里，由慈濟醫院志工陳世淵引導，前往集訓可能地點三處調查，並訪錄當地耆宿兩人以及參觀今天的榮民總院玉里分院。

¹⁸ 朱泓源主訪，楊力明、王賢舜陪訪，朱泓源、龍躍、林廣挺紀錄，〈王毓楠先生訪問紀錄（稿）〉，2017 至 2019 年間共進行十次訪錄。

¹⁹ 另一說為開設「軍官學校」，其詳待查（Bo Min Khaung, 1968: 164）。

²⁰ 泉谷達郎寫道：「緬甸的志士們，之前為了偽裝都穿著海軍的服裝，直到離開三亞訓練所之際才初次穿上陸軍的服裝，然後掛上兵長的階級章，看起來就像是受訓中的幹部候補生的模樣。因此，抵達玉里時不但受到鎮民盛大的歡迎，而且沒有任何一個人起疑」（泉谷達郎，1989: 78）。

²¹ 尤其英軍，但不止此，有時變回平民、化裝成緬甸和尚，甚至穿上日軍、華軍制服。

²² 泉谷達郎對於這些極機密，甚至是絕對機密的史實，只能寫得較隱晦，此處為朱泓源根據國軍顧問團團長林蔚中將的〈緬甸戰役得失評判〉（林蔚，1943）所提國軍在第一次入緬所遭遇之困境，所做進一步的推斷。

行滲透任務。10月15日，南機關長鈴木敬司由曼谷飛來臺北，對玉里訓練所下達了初次的出動命令。18日，第一批4名緬甸反英份子由玉里抵達高雄港，搭乘商船廣盛丸至曼谷（泉谷達郎，1989: 80-81）。

1941年11月15日，日軍大本營決定「促進對中美英荷戰爭早日結束之腹案」（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1997: 20），成為日軍發動緬甸作戰的重要依據，其中並明訂「訂定促進緬甸之獨立，並利用其成果刺激印度之獨立」作為屈服英國之手段（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1997: 18）。當天，人在東京的翁山受日軍參謀本部之令出發前往福岡，並於17日搭機前往臺北。18日抵達臺北後，翁山與南機關在臺日籍幹部於乃木館商討後續任務事宜，直到11月27日方離開臺灣，前往曼谷。在此期間，於玉里受訓的緬甸武裝分子第二批6人亦於23日搭船赴泰（溝口郁夫，2012: 85-88）。此時，因大本營海陸軍部間對南機關的主導權問題有所摩擦，而於11月24日決定自次月1日起將該部改隸日軍專司東南亞作戰的「南方軍」，成為南方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大將的直屬機構作為妥協方案。據此，總部將即刻遷移至南方軍司令部所在的西貢（泉谷達郎，1989: 91）。²³南機關所屬人員則為了呼應日軍對緬作戰，配屬第十五軍指揮，準備實施相應之「謀略」工作（綠川巡，1998: 167）。

12月1日，南機關正式改隸南方軍直屬當天，鈴木機關長下達南機關全體遷移的命令，其要點包括：（1）泰國辦事處之一部繼續留守當地，主力則於當月上旬前往西貢與南機關本部聯絡。（2）臺北支部亦需儘速前往西貢。（3）機關長將於12月3日搭機前往西貢，並於西貢本部執行任務。在此之前的11月27日，鈴木亦飛抵臺北，向玉里下達第三批潛入緬甸的出動命令。玉里方面儘速選出了11名成員，準備經由高雄飛往西貢，其中包含了日後成為緬甸軍政府領導的尼溫（Newin）在內。與此同時，在玉里的南機關日籍訓練幹部也奉臺灣軍司令部之令，派員前往臺北，接收「謀略用」特種武器（緬甸國軍事顧問部，1944: 56; 泉谷達郎，1989: 91）。這些武器包括了可以藏入掌心的小型手槍、偽裝成萬年筆（墨水筆、鋼筆）的毒藥注射器、睡眠用藥品、縱火磚、爆破罐、偽裝成煤炭的炸藥等（齋藤充功、坂茂樹，2015: 15）。南機關在接收這

²³ 原本在稍早時的11月21日，參謀本部派遣的門松正一中佐即已飛抵南機關總部所在地曼谷與鈴木會面。其後，依據會面的結果，南機關決定成為南方軍司令官寺內壽一的直屬機構，總部即刻遷移至南方軍司令部所在的西貢（泉谷達郎，1989: 91）。

批武器後，在日軍偷襲珍珠港前一天的 12 月 7 日由臺北裝上特別列車，以鐵路運往高雄（緬甸國軍事顧問部，1944: 56）。12 月 6 日，仍在玉里的訓練班剩餘成員，在鈴木中尉的率領之下，經花蓮港搭船至高雄港集結。但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高雄港內船隻航行管制，故一時之間沒有船隻可以搭乘出航。最後在南機關成員川島大尉返回臺北與臺灣軍司令部、海軍府交涉之後，滯留臺灣的剩餘緬甸武裝分子才於 12 月 17 日搭上開戰後最早啟航的船班前往西貢，然後再以陸路急行軍前往曼谷（泉谷達郎，1989: 95）。²⁴

要之，南機關的日籍幹部及在臺灣訓練的緬甸獨立份子主力，分別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由臺北、高雄、花蓮等機場或海港出發，集結於西貢後再向曼谷集中（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1997: 171），並計畫在短時間內招募旅泰的緬人壯丁，初步編成一小支緬甸獨立軍。在南機關各部抵達曼谷後，臺灣仍然在支援南機關與日後的緬甸獨立軍骨幹的任務上，以兵站基地的地位發揮作用。1941 年 12 月初，南機關向陸軍省提出希望能追加接收武器彈藥以「達成任務」，陸軍省於 12 月 3 日行文臺灣軍司令官轉達前者之申請。其中包括九三式迫擊砲彈信管 133 具、九二式重機槍普通彈 1,200 發、穿甲彈 150 發，以及四二年式爆破用雷管 60 具。從這批武器清單來看，包括了爆破用的雷管在內，故可以推測應是南機關於緬甸境內從事爆破等特戰任務之用。

珍珠港事件爆發當天的 12 月 8 日，陸軍省密電臺灣軍參謀長，告知陸軍決定將上列武器彈藥藉由岡部隊（岡 9326 部隊，為日本陸軍直轄之空運部隊，日軍佔領東南亞後改稱南方航空輸送部），運抵臺灣後於當地移交給南機關（陸軍省兵器局銃砲課，1941）。²⁵從上列電文的內容，也反映了臺灣在太平洋戰爭初期作為日軍對東南亞等地發動侵略作戰時的重要後勤、集結基地之地位。

²⁴ 離開臺灣的時間，或謂：六人從玉里到基隆港，11 月 23 日出發到曼谷。三人從玉里坐火車到臺北（Bo Min Khaung, 1968: 168）。

²⁵ 關於岡部隊的介紹請參考德田忠成（2008）。

四、日軍入侵緬甸與緬甸獨立軍之活動

（一）南機關的對緬工作方針

為達成切斷滇緬公路、斷絕中國對外陸上交通的戰略目標，日本以支援緬甸人的愛國獨立運動為由，訓練翁山在內的反英武裝份子，並令其在泰緬邊界招募流亡境外緬甸獨立份子組成武裝部隊，協助日軍進攻緬甸。待攻入緬境後，更準備立即在各地就地編練民眾，以擴大獨立軍，展開廣泛的全國性獨立運動（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1997:13）。

南機關在日軍入侵緬甸時擔負的主要任務，及其執行方式為何？在此，將依據現存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資料中心的戰時極機密檔案《緬甸工作相關報告》（原文為：《緬甸工作ニ關スル件報告》）所載之內容加以分析。該報告原為日軍南方軍總司令部在1942年9月上呈首相兼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參閱之檔案，除正文之外，另附有一份1941年制定之〈南機關緬甸工作計畫〉作為別冊，為紀錄南機關在1941-1942年緬甸戰役所擔負之任務內容最機密、最具證據性之史料文本。〈南機關緬甸工作計畫〉記載之對緬工作概要如下（南方軍總司令部，1942）：

- 1、工作方針：旨在呼應日軍之緬甸進入作戰，激發橫互緬甸領土全境的動亂，使敵方無法遂行作戰指導並促使緬甸人全面協助日方。
- 2、實施要領：南機關指揮緬甸獨立黨員，組織騷擾部隊，破壞國內政治組織，引發動亂，並編成志願軍，形成獨立政權的實力核心。兩者並相互呼應，先在丹那沙林地區成立臨時政府，其次則應儘速攻略仰光，驅逐英國政府以確立獨立政權之基礎，而後逐次戡定上緬甸以完成獨立。本工作即為與日軍的緬甸進入作戰緊密聯繫以進行之。

換句話說，1942年緬甸戰役期間所出現的「緬甸獨立軍」實際上乃是日本侵略緬甸的第五縱隊。

（二）「三十志士」與緬甸獨立軍的成立

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2日，與日本同為

軸心國成員的德、義對英美宣戰。當天傍晚，南機關長鈴木敬司等人搭乘汽車由西貢返回曼谷（緬甸國軍事顧問部，1944: 58）。兩天後的十四日，鈴木大佐與林部隊（即日本陸軍第十五軍）聯絡，就作戰謀略相關問題進行討論。此時，在當地與南機關關係匪淺的鹽水港製糖會社，亦將駐泰社員全數任命為南機關軍屬。12 月 21 日，南方軍向南機關傳達：作戰準備於月中就緒，武器將於二、三日內運抵曼谷，但已在臺灣進行教育訓練之緬甸獨立志士尚未於西貢集結完成的消息（緬甸國軍事顧問部，1944: 59）。26 日，南機關重要日籍成員大致於曼谷集結完成，因此得以於翌日為招募到的新兵舉行入伍典禮，機關長以下親臨參與。緬甸獨立義勇軍，即所謂的緬甸獨立軍大致編成。28 日舉行新兵宣誓典禮，在臺灣接受訓練之緬甸武裝份子 11 名也於此時抵達（緬甸國軍事顧問部，1944: 60）。

最初參加獨立軍者，係從泰國北部之具林地區（不願被英國統治之 5,000 人聚集地區）招募了 300 人（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1997: 182）。到了 1942 年 1 月，緬甸獨立軍從曼谷出發正式參戰時，其總兵力大概增加到將近 700 人左右（表 2）。²⁶其軍司令官由南機關長鈴木敬司大佐擔任，鈴木並以「南大將」的偽裝身份指揮作戰。至於參謀長則為化名村上少將之南機關參謀野田毅大尉擔任。此外，緬甸獨立軍高級參謀分別由化名為「面田少將」的翁山及化名為「赤田中佐」之緬甸反英份子拉棉擔任（緬甸國軍事顧問部，1944: 65-66）。

至於緬甸獨立軍的編制部分，除了上述軍司令部、毛淡棉、土瓦兩兵團與各支隊之外，還包括由日軍田中征六郎中尉擔任班長之「田中謀略班」（配屬第五十五師團），以及由尼溫以下 8 名組成之「緬甸國內擾亂軍指導班」（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1997: 172-173）。由於這兩支擔任敵後破壞任務的特種部隊與本文有密切關係，故須稍加簡介其任務與參戰概況。

戰場謀略班最初先於開戰前潛入泰國美索（Mae Sot）對岸之緬甸妙瓦底（Maywaddy）地方擔任宣撫工作。日軍發動緬甸作戰後，則配屬於第五十五師團，在師團長的指揮下擔任戰場謀略任務，配合日軍之進擊，在其前後左右擔任神出鬼沒的觸角般的角色（緬甸國軍事顧問部，

²⁶ 兵員數為 1942 年 1 月由泰國出發時的概數（綠川巡，1998: 167-168）。

1944: 86; 綠川巡, 1998: 171)。到了 1942 年 3 月進入戰役第二期後，該部又轉調至第三十三師團，協助第三十三師團確保仁安羌等重要油田（緬甸國軍事顧問部，1944: 98）。

其次，緬甸國內擾亂軍指導班為戰略性組織，負責先期潛入緬甸境內各地，以廣泛推動反英以及獨立活動、呼應日軍攻擊緬甸以擾亂敵軍後方為目的。在太平洋戰爭開戰前，擾亂軍指導班即已預先派遣幹部，於 12 月 3 日從泰國美索附近潛入緬甸。到了美日開戰後的 12 月底，又再派員由泰緬邊境潛入緬甸境內。這批要員分散至緬南的仰光、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帶，接著北上緬甸中部，至同古（又稱東吁、東瓜）、曼德勒等地，各進行招募緬人組織擾亂軍以騷擾盟軍作戰之任務。

因擾亂班成功地在三角洲地區組織大量擾亂軍，形成優勢，迫使英軍從仰光撤退。擾亂軍隨即趁勢進入仰光城佔領要點（3 月 7 日午後），迎接日軍入城（綠川巡，1998: 172）。另外，在平滿納（Pyinmana）附近製造了三次敵方軍用列車翻覆事故（南方軍總司令部，1942），據稱殺死之中國兵達到 300 名之多。²⁷

表 2、緬甸獨立軍成軍時編制與兵力

部隊名	人數
緬甸獨立軍司令部	
毛淡棉兵團	約 470 人
北島部隊	約 70 人
鈴木部隊	約 400 人
土瓦兵團	約 100 人
水上支隊	約 100 人
丹老／馬圭（Mergui）支隊	約 15 人
合計	約 685 人

資料來源：南方軍總司令部（1942）。

²⁷ 平滿納製造列車出軌意外的紀錄最早可追溯到 1942 年之〈緬甸工作二關スル件報告〉，但該報告並未提及造成之傷亡。反而是戰後綠川巡的作品中提到此數（南方軍總司令部，1942; 綠川巡，1998: 170-171）。

（三）緬甸獨立軍第一期作戰概況（1942/1-1942/3）

緬甸獨立軍於 1942 年元月開始與日本陸軍第十五軍多方面密切合作：一方面，先攻毛淡棉、下土瓦，另一方面，一邊作戰一邊招募新軍。其次，緬甸獨立軍主力還肩負了對緬甸民眾進行宣撫、蒐集盟軍情報以及獲得當地物資等任務。以下為緬甸獨立軍各部隊從 1942 年 1 月緬甸作戰第一期開始，到進佔仰光為止的作戰概要：

1. 土瓦兵團

1 月 4 日土瓦兵團從曼谷出發，經北碧府（Kanchanaburi），再由該府之柿約（Saiyok）縣邦提（Bongti）村進入緬甸境內，向土瓦進發，並於 19 日協同日軍第 55 師團 120 聯隊（又稱沖支隊）攻佔當地（中野校友會，1978:370）。待進佔土瓦之後，該部先暫停數日，逐次招募緬甸人壯丁以增加緬甸獨立軍之兵力，隨後於 1 月 26 日跟隨 120 聯隊往北經木冬（Mudon）朝毛淡棉前進（中野校友會，1978:370；綠川巡，1998:170-171）。²⁸然而，抵達毛淡棉後，土瓦兵團始獲悉緬甸獨立軍主力之毛淡棉兵團與緬甸獨立軍司令部已改由泰緬邊境經更遠的北方向薩爾溫江方面迂迴，不再進入毛淡棉（詳後述）。因此，土瓦兵團於 2 月 14 日奉命改變作戰方向，與緬甸獨立軍主力會合。受此作戰計畫變更影響，土瓦兵團除一部滯留於土瓦及毛淡棉、丹那沙林擔任警備任務之外，其大部兵力（此時因在土瓦與毛淡棉等地招募緬甸新兵之故，規模已從曼谷出發時僅百餘人的兵力膨脹至 400 餘人）沿薩爾溫江北上，逐次於 2 月中旬與獨立軍主力會合，渡過薩爾溫江、比林河（Bilin river）。2 月 25 日，土瓦兵團偕同緬甸獨立軍主力於錫當河畔的庫錫克（Kunzeik）渡河，²⁹並於次日滲透至曼德勒公路上的塔宋（Tarson）與英軍交火。3 月初，土瓦兵團與獨立軍主力分離，進入山區抵達勃固附近，一面配合日軍攻擊勃固，一面威脅勃固—曼德勒公路，於 3 月 8 日進入仰光城（綠

²⁸ 又，據《南機関外史》所述，提及土瓦兵團主力（該書稱為川島兵團）與獨立軍主力會師前，獨立軍先於 2 月 11 日抵達薩爾溫江東岸兩哩之古錫克（Kuzeik，與內文之庫錫克非同一地）後，為重新整編部隊而休息數日，其間獨立軍主力並派員試圖與位其南方帕安方面的土瓦／川島兵團、田中謀略班與水上支隊等建立聯繫，獨立軍之前哨最後於帕安與土瓦／川島兵團接觸，獨立軍各部（原文作「全線」）開抵薩爾溫江東岸。其後，獨立軍於 2 月 18 日分數梯次渡過薩爾溫江（緬甸國軍事顧問部，1944:86-87）。

²⁹ 由文意來看，土瓦／川島兵團與緬甸獨立軍主力會師，應在 2 月 11 日至 18 日之間。

川巡，1998:171；中野校友會，1978:371-372）。此外，土瓦兵團中負責在丹那沙林擔任警備之一部，後來也解除警備，追入仰光。

另外，在開戰時，土瓦兵團南方尚有與馬圭支隊與水上支隊兩隻小部隊活動。首先，水上支隊滲透至緬甸最南端的維多利亞角及其周邊地區招募緬甸人（約 40 名）、接收裝備與收集民船，而後於 1 月 17 日由海路進佔馬圭。至於馬圭支隊，則於 1 月初從曼谷出發，穿越泰緬邊境經緬甸南部的丹納沙林向馬圭進發，至 2 月 2 日抵達當地。其後，水上支隊與馬圭支隊又陸續推進至土瓦，與土瓦兵團相呼應，進軍毛淡棉。在土瓦兵團改變作戰目標後，馬圭支隊跟隨前者行動，水上支隊則為登陸伊洛瓦底三角洲前的海上機動預先準備，至 3 月 4 日才從毛淡棉南方出航，以機帆船橫越安達曼海，於仰光西南方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登陸。水上支隊登陸後，一路向北滲透並散播「有力日軍部隊與義勇軍在三角洲登陸」的謠言以擾亂英軍。到 3 月中，水上支隊兵力已膨脹至 800 人左右（中野校友會，1978:369-372）。

2. 毛淡棉兵團與獨立軍司令部

在南機關成立緬甸獨立軍之初，原本計劃將毛淡棉當作對緬甸進行滲透作戰的重要據點，甚至為此將緬甸獨立軍主力賦予毛淡棉兵團的稱號（中野校友會，1978:368）。然而，自 1 月 11 日獨立軍司令官鈴木敬司率幕僚從曼谷出發移駐泰緬邊境的來興後僅僅兩天（緬甸國軍事顧問部，1944:69），鈴木在來興與日軍第五十五師團長會談後，卻放棄了將緬甸獨立軍主力開入毛淡棉的計畫，改由經泰國西北部的湄康穿越邊界，迂迴深入緬甸中部境內。該會談的內容與緬甸獨立軍作戰地域臨時變更的原因，即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鈴木也一直三緘其口（中野校友會，1978:368）。不過，從後來編纂的日本官方戰史及相關學術論著中，多提及鈴木敬司對攻佔緬甸後的佔領地處理方針和南方軍發生衝突一事來看，³⁰或可推斷緬甸獨立軍變更作戰地區的原因也與此相關。

³⁰ 依據日本防衛廳於 1967 年編纂的戰史叢書《ビルマ攻略作戰》所示，鈴木敬司希望在日軍攻佔緬甸後儘速「自主獨立」，卻受到南方軍與第十五軍的反對。此後如波多野澄雄等學者亦多採此說，但武島良成則認為鈴木的推動緬甸「獨立自主」說，本質上仍然是在日本的介入、指導下進行，還是與戰前、戰時日本在各地扶植傀儡政權的模式有雷同之處，故認為還有進一步探究之必要（武島良成，2001:591-595、599）。

總之，鈴木敬司率領不滿百名的直屬部隊以及約兩千名泰國人苦力（綠川巡，1998: 171），率先穿越險峻的泰國西北邊境山岳地帶，於 2 月 7 日抵達泰緬邊境的他頌央（Tha Song Yang），進入緬甸境內（中野校友會，1978: 369）。最終於 2 月 11 日抵達第一目標：位於克倫（Karen）邦境內、接近薩爾溫江東岸的古錫克。然而，就在鈴木於當地稍事修整並展開招募緬甸青年以及肅清鄰近區域的工作時，由於獲得了第三十三師團在南邊的帕安（Pa-an）渡過薩爾溫江的情報，故當場決定在其上游地帶渡過薩爾溫江，一面從帕本（Papun）南側地區威脅英軍側翼、一面向錫當河谷前進。2 月 18 日，部隊從梅錫克（Meseik）渡過薩爾溫江，進入梅普里（Mepli）（緬甸國軍事顧問部，1944: 86-87；中野校友會，1978: 369）。

接著，獨立軍由梅普里往西，經勃固邦的美加塔（Mekahta），於 2 月 25 日到達錫當河畔的庫錫克。當天，從當地居民取得情報，獲悉錫當河右岸已無大規模敵軍，因而立即渡過錫當河，切斷曼德勒公路，以盡速向勃固進攻，從日沒時分出發，朝塔宋（Tarson）方向前進。此時，除了遭到英軍空襲之外，沒有受到任何一丁點抵抗。26 日夜間，獨立軍佔領塔宋十字路口，切斷曼德勒公路的交通，但 27 日接近拂曉時分，由於遭受到有戰車掩護的敵軍攻擊，判定不利與敵方直接交戰，而撤退至錫當河右岸附近的奧波（Okpho）（綠川巡，1998: 169；中野校友會，1978: 371）。

3 月 2 日，隨著日軍渡過錫當河，獨立軍從奧波附近再度出發，不斷地沿著日軍的「外側」位置西進。³¹隨後，「M 兵團（毛淡棉兵團）主力」再次展開行動，於塔宋附近重新跨越曼德勒公路，進入勃固山脈（這段行程應為 3 月 3 日至 6 日）。³²

3 月 8 日，獨立軍以主力佔領蒲基（Phugyi）、一部以佔領岱枝（Taikkyi）東側（兩者皆在仰光—卑謬鐵路線上，且卑謬公路亦通過後者市區）為目的，嘗試切斷敵軍之撤退路線而努力。然而，結果只破壞了鐵橋，撤退之敵軍最常利用的卑謬公路則因戒備極為森嚴之故而無法

³¹ 《陸軍中野學校》原文作「第三十三師団の外方」，但是判斷應該是走在日軍主力的先頭部隊前面，或引路或從事曉諭民眾以支持日軍的重要工作（中野校友會，1978: 371）。

³² 「M 兵團主力」一語引述自《南機関外史》，顯示緬甸獨立軍在第一期作戰階段將跟隨緬甸獨立軍司令部行動的毛淡棉兵團視為作戰主力（緬甸國軍事顧問部，1944: 87）。

將之切斷（綠川巡，1998:169）。接下來，獨立軍在3月10日夜間於岱枝南方地區渡過萊河（Hlaing River，即仰光河之別名），進入（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掃蕩殘兵敗卒的同時，一面佔領同地區一面向南挺進，最後於3月13日上午9點進入仰光（綠川巡，1998:169-170）。³³

表3、緬甸戰役第一階段末期緬甸獨立軍兵力概數表

部隊名	兵力
毛淡棉兵團	約 1500 名
土瓦兵團	約 2500 名
水上支隊	約 800 名
丹老／馬圭支隊	約 60 名
小計	約 4860 名
擾亂軍	人數不明，但不低於 5000 人
合計	約 10000 名

資料來源：南方軍總司令部（1942）。

（四）第二期：攻陷仰光及上緬甸作戰

1. 進入仰光與獨立軍成軍

獨立軍（欠水上支隊）於3月8日至當月底之間，因大致完成進入仰光，故先進行編成與裝備的充實強化，準備北伐。

從4月1日起，原本由日籍幹部指揮的部隊，除總司令官之外之所有指揮官均更換為緬甸人，日本軍人為指導官（顧問）的方式以進行重

³³ 又，《南機関外史》所載緬甸獨立軍主力之毛淡棉兵團於3月10日至3月13日進入仰光為止的作戰行動為：10日渡過萊河後，先是擔任尖兵的北島部隊與撤退中之英軍小股部隊發生遭遇戰，排除英軍抵抗後，又派出小規模部隊至萊河畔各村落收集船隻，其後直到3月12日M兵團才為了不流血入城而用船隻沿萊河順流而下前往仰光。從此段敘述來看，獨立軍主力為何入城較晚的原因，可能跟該部當時的任務是迂迴至仰光北方，試圖切斷、截堵由該城撤出的英軍部隊，以及渡過萊河後，進入河沼縱橫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缺乏船隻使用以及行動緩慢有關（緬甸國軍事顧問部，1944:88）。

編。最後編成兩個師團、一個獨立聯隊，共 7 個聯隊的兵力，並另置謀略部，而國內擾亂軍也納入(獨立軍)的統括指揮(南方軍總司令部，1942)。其中，第一師團長(三個聯隊編成)為「三十志士」之一的尼溫大佐。其次，第二師團長(三個聯隊編成)則為伯澤雅(Bo Zeya)大佐。³⁴獨立第七聯隊長為德欽通盛中佐(Thakin Tun Shein)。至於仰光警備隊長則為德欽通瑞(Thakin Tun Shwe)(綠川巡，1998: 172-173)。

2. 上緬甸作戰

如此，獨立軍以一部擔任仰光市內以及下緬甸之警備，主力則為了協助日軍對上緬甸的作戰而於 4 月 8 日從仰光出發(中野校友會，1978: 376)。12 日，獨立軍主力進入卑謬，將水上支隊納入指揮之下予以合併後，配合於伊洛瓦底江右岸地區行動之第三十三師團由左岸切斷英印軍之撤退路線而進擊。其後，獨立軍主力自卑謬出發，再經沙林、塔馬道(Tamadau)、甘尼、卡薩等地，至 5 月 29 日時其先頭部隊抵達八莫。尚有有力部隊之一部由卑謬經陸路派往阿拉干／若開地區，並於 4 月 3 日佔領當地。其他一部則派遣至印緬國境要衝之塔曼迪(Hta Man Thi)，於 6 月 23 日抵達當地(綠川巡，1998: 173-174)。至此，緬甸全境大致淪入日人之手。到 5 月底時緬甸獨立軍各部隊之兵力規模，若依南方軍總司令部的《緬甸工作相關報告》文末所付別冊第二〈南機關對緬工作報告〉(原文為：〈南機關對緬工作ニ關スル報告〉)之統計，加上檔案中稱為「護鄉軍」，³⁵但實際上應為擾亂軍之部隊，其總數可達 162,000 人(表 4)。

當然，戰後有人研究，認為此數或有過分誇大的可能(綠川巡，1998: 174)。但是真假之間，需要具體還原現場原狀來重新比對。

張鑄勳與盧潔峰都重視日軍的戰報認為日軍的報告具體而真實。因此，本文舉出張鑄勳所完全拷貝的日軍所繪仁安羌現地戰役圖(圖 1)，作為依據，並用日文與英文史料，再進一步加以勘定。

³⁴ 2015 年論文稱之德欽拉孟。

³⁵ 日本及緬甸獨立軍正規軍通過後，因其佔領地區將有陷入無政府、無警察狀態之危險，故隨即於各地編成了作為緬甸獨立軍別動隊的護鄉軍(Town Guard)，以擔任掃蕩敵軍殘敗兵力及維持治安的任務(綠川巡，1998: 176)。

表 4、1942 年 5 月底緬甸獨立軍各部隊兵力概數表

部隊名	兵力
上緬甸地區之緬甸獨立軍	10,000
下緬甸地區之緬甸獨立軍	2,000
護鄉軍	150,000
合計	162,000

資料來源：南方軍總司令部（1942）。

說明：護鄉軍的兵力概述在林集團司令部作成之報告書中為上述所稱之 150,000 人，但《陸軍中野學校》以及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ビルマ進攻作戰》則稱只有 15,000 人（第十五軍參謀部，1942；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1997）。以上數字何者為真實在難以判斷，如果一定要說的話一般推測後者所顯示的概述較具可靠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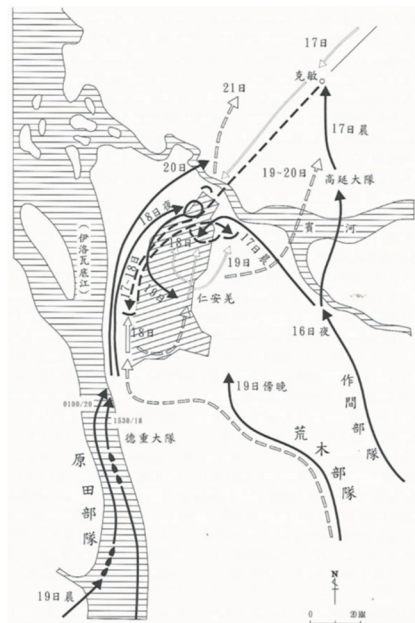


圖 1、仁安羌現場作戰圖

資料來源：張鑄勳（2015:311）。

說明：日人所繪現場圖，可見最重要的地方是：英緬第一師在 19 日從被圍之地，分三路突進，配合南攻的華軍，於擊潰日軍之後，從 19 至 20 日自東北角突圍，並且跨過乾涸的賓河河道。

五、仁安羌戰役中之緬甸獨立軍參戰問題考

（一）駐緬國軍高層對「緬奸」的分析

日軍竟然只以四個月不到的時間擊敗英華兩軍，而華軍戰志極高，對於為何大敗，當時的參謀團團長林蔚中將有透徹的分析。在林蔚於該年秋天所寫的《緬甸戰役得失評判》（林蔚，1943:138）報告書中曾提及日軍在政治以及情報作戰上成功運用緬人的情形。例如林蔚在報告中有「所見」一欄，做更全面的檢討。就國際關係方面，提及敵人對於緬甸，其功夫下得深，因此「敵先勝我一籌」：

我軍因對盟友關係，不能宣傳解放緬甸，敵則可以謊言³⁶扶助緬人獨立，以博取緬人歡心。因之宣傳工作，敵先勝我一籌。

簡言之，進入緬境的華軍，已在南機關的操作下，被相當部分的緬甸民眾誤以為是協助英國壓迫緬人的敵軍。相反地，由於南機關的宣傳，翁山與尼溫等菁英所領導的緬甸獨立軍獲得群眾響應，而得以發揮極大功效。此外，在組織方面林蔚也看出「敵有德欽黨供其利用，無孔不入，我所借助者，僅為緬甸政府」（林蔚，1943:122-3）。其實局勢之嚴重不僅如此，這時不僅英緬政府面臨緬甸群眾的叛變，日本情治機構也已經在仰光與眉苗兩大重鎮部署了綿密的情治網絡，而緬甸獨立軍的謀略班、擾亂班以及宣傳部門已經急速擴大，並且得到整個社會的響應。

再者，林蔚整理國軍失敗的原因中，曾特別提到當地人民與僧侶與華軍為敵，甚至在華僑眾多的城市暴動與製造混亂。以下舉兩個例子，如（林蔚，1943:120-121）：

1. 敵機轟炸曼德勒，則緬僧趁亂放火，敵在細胞（西保）、平滿納、葉尼，各附近降落奸細，我迄未拿獲。
2. 西路敵軍進攻普羅美（卑謬），而普羅美、斯維當之緬民幾全部參加敵軍作戰，並威脅英軍團部所在地之阿藍廟及蔡耶特模東路敵軍突破羅衣考，而崇吉發生暴動，該敵軍進攻猛旁，而雷列姆陷入混亂狀態。

³⁶ 謊言，詐欺、不實在。

除此之外，林氏的報告中也敘述了獨立軍（其筆下稱為「緬奸」）確實襲擾國軍、協助日軍作戰的實況：「前述各項混亂狀況，除電話不通大部因英軍佔線外，其餘若不為敵之政治工作，則發生之時機與地點太巧合，我軍前方有緬奸為敵軍帶路。」（林蔚，1943: 120-121）

總之，林蔚發現：與國軍聯手的盟軍背後，竟有配合日軍作戰的龐大組織。故寫道：「我聯合軍之後方，非有大規模之組織，及發縱指使者，不能有如是切合作戰之效果。」

總而言之，國軍第一次入緬作戰的失敗原因之中，國軍前方有緬奸為敵軍帶路，而盟軍之後方空虛，讓日軍與緬甸獨立軍潛伏的情報人員有機可乘，也是另一個嚴重的問題。

（二）緬甸獨立軍在上緬甸實施「擾亂」作戰

儘管緬甸獨立軍在日軍入侵緬甸期間發揮重大作用，但是我方戰史迄今對緬甸獨立軍幾乎隻字未提；而國人對於「南機關」的事蹟，也要到 2015 年起本研究團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之後，才開始注意（朱宏源、蕭明禮、姚敏芝，2015）。不過，緬甸獨立軍為何會出現在仁安羌戰場，還得從日軍緬甸作戰的規劃階段開始談起。

南機關在緬甸指揮緬甸獨立軍煽動民眾、破壞中英盟軍作戰的計畫，特別是跟仁安羌戰役最早有關的部分，可能可以追溯至日軍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前夕。根據前述日軍南方軍總司令部在 1942 年 9 月上呈東條英機《緬甸工作相關報告》所附〈南機關緬甸工作計畫〉「國內（緬甸境內）擾亂」項第三條中，特別提到其目標除了「實施擾亂的目標為盡力確保我軍（日軍）遂行作戰必要之糧秣及其他諸項物資暨設施」之外，更需要「力圖迅速、完全地佔領在緬甸的石油生產機構」。其次，在該計畫的「義勇軍之行動」項第五條中註明，在緬甸作戰的第三期（從攻佔仰光到「戡定」上緬甸為止）階段中，「義勇軍」（即林蔚筆下的「緬奸」）主力的任務為「力圖將殘存之英政權及重慶政權³⁷一掃而空之同時，並擔負日軍所必需之物資資源的佔據、確保。為此，將視需要接受日軍的協力或援助。」（南方軍總司令部，1942）

³⁷ 即代表中國正統、遷都重慶的中華民國政府。

從以上的敘述可知，日軍非常在意緬甸有數石油產地的仁安羌及其周遭的油田與生產設備的控制，意圖完整奪取當地的油田設備，以供資源缺乏的日本，維持其戰時經濟之運作與確保戰時軍需生產、軍隊作戰行動所需的燃料來源，其戰略意義不言可喻。所以，為確保日軍能順利攻佔仁安羌油田，勢必要動用緬甸獨立軍以支援日軍作戰，也就是說：緬甸獨立軍所屬的擾亂軍會出現在仁安羌，其實早在日軍入侵緬甸前就已設定。日軍報告也不隱諱，參見圖 2。



圖 2、緬甸志願軍行進路線圖

資料來源：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1997: 627）

說明：部分圖說文字以及紅色、藍色指示線為作者所加。

在這樣的背景下，擾亂軍投入仁安羌戰役已有跡可循，但該部在仁安羌戰役期間的作戰情形如何？爰引用在〈南機關對緬工作報告〉中有關緬甸獨立軍所屬之國內擾亂軍在上緬甸地區的擾亂作戰記錄。內容如下（南方軍總司令部，1942）：³⁸

國內擾亂軍納入謀略部的指揮之下，並派遣了佔領仁安羌油田以及切斷中國軍撤退路線之（兩支）部隊。仁安羌派遣部隊沿著緬甸西海岸道路前進，雖然於4月19日抵達仁安羌，但因敵軍兵力強大，無法搶先於日軍之前佔領當地。另外，中國軍撤退路線切斷部隊方面，也在平滿納東方附近的山區遭到敵方發現而瀕於全軍覆沒，（作戰）以失敗告終。

〈南機關對緬工作報告〉對於仁安羌戰役的敘述其實並不詳細，但從少量的文字中大略可推測緬甸獨立軍／北伐獨立軍所屬之擾亂軍在仁安羌戰役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首先，從擾亂軍沿著緬甸西海岸道路由西向東朝仁安羌進發，並於19日才抵達仁安羌此點來看，雖然其開抵當地的時間早於日軍官方宣稱佔領仁安羌的日期（4月20日），但此時早有日軍二一四聯隊（作間部隊）等其他部隊在當地作戰，因此就算擾亂軍確實曾經進入當地作戰，但也面臨與其他日軍部隊競爭誰先能攻佔仁安羌的壓力。

再者，由報告中註明「敵軍兵力強大，無法搶先於日軍之前佔領當地」一語顯示：第一，承認敵軍（即國軍一一三團）兵力強大。第二，由此證明在4月19日仁安羌戰役最高潮階段，該擾亂部隊曾經試圖攻擊盟軍，以搶在仍於包圍圈南面與盟軍苦戰的二一四聯隊之前進佔仁安羌，但終究「無法搶先於日軍之前佔領當地」。

據此，可見當時原以為有能力，但結果卻因本身戰鬥能力仍不如盟軍（畢竟是南機關與緬甸獨立軍在當地臨時招募的緬人組建而成）而慘遭擊退。顯然有相當的犧牲而且被盟軍視為日軍。

³⁸ 〈南機關對緬工作報告〉之敘述也與《陸軍中野學校》的說法類似，但後者僅稱「北伐先鋒的擾亂軍，以佔領仁安羌油田以及切斷中國軍的退路為企圖而行動，但仁安羌有強大的英印軍直接在當地進行防禦，在平滿那東方對中國軍的奇襲也告失敗且我方損失甚多，故兩者都很遺憾地未能成功」，而〈南機關對緬工作報告〉則明確提到緬甸獨立軍（北伐獨立軍）於19日抵達仁安羌附近；至於平滿那方面的作戰，更承認緬軍面臨幾乎全軍覆沒的失敗（綠川巡，1998: 174；中野校友會，1978: 366）。

（三）仁安羌戰役戰況還原

由於南機關相關檔案中，對於緬甸獨立軍在仁安羌戰役期間活動的紀錄仍有諸多不明之處，故吾人將進一步考察第三十三師團所屬各部在仁安羌戰役的動向。藉由重建實際戰鬥過程，解開緬甸獨立軍在該役中的作戰真相，並藉以釐清仁安羌戰役中幾個決定性時間點的爭議。

1. 日軍進攻仁安羌與國軍解圍作戰

首先，據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資料中心收藏之第十五軍參謀部，於 1942 年緬甸戰役剛結束不久的 6 月 15 日編製之《緬甸作戰經過概要》（原文為：《緬甸作戰經過の概要》）³⁹，顯示戰役經過如下（第十五軍參謀部，1942）：

（1）《緬甸作戰經過概要》之一：參與的作戰雙方部隊

參與仁安羌戰役的主要部隊為日軍第三十三師團所屬之作間部隊（以步兵第二一四聯隊為主力，並配屬山砲一大隊），早在 4 月 16 日晚間就已抵達仁安羌東北方 6 公里處的賓溪大橋（又稱賓河大橋），並切斷了英軍往東北撤退之路線，隨後於 17 日清晨「0730」分佔領了油田區的中心地帶（第十五軍參謀部，1942）。然而就在此時，由馬圭方面撤退而來「擁有戰車 15 輛、火砲約 15 門、汽車約 300 輛，總數約 4,000 人的敵軍殺到仁安羌南方地區（此即英緬軍第一師）」⁴⁰。此外，「又另外有配屬戰車 10 輛、汽車百輛，約 1,000 人的敵軍自東北方前來」。這兩支部隊「攻擊執拗，對我（日軍二一四聯隊）南北夾擊」（第十五軍參謀部，1942）。

這段敘述明顯是指英緬軍第一師在仁安羌被圍，國軍一一三團與英軍裝甲部隊協同對仁安羌發動解圍，但日軍作戰紀錄卻對該部隊之真實身份略而不談。

³⁹ 又，〈從國際政治重建中日仁安羌之戰（1942）實況〉一文（朱泓源、蕭明禮、楊力明、林天順，2017）所引述之戰後 1946 年成立之日本第一復員局（前陸軍省）編纂之《緬甸作戰紀錄 第一期》一書（第一復員局，1949），其內容應是以 1942 年《緬甸作戰經過概要》（第十五軍參謀部，1942）為基礎撰寫而成。

（2）《緬甸作戰經過概要》之二：南方「敵軍」嘗試突破與持續死鬥直到 20 日潰滅為止

關於盟軍解圍的進一步紀錄，在《緬甸作戰經過概要》又寫道「特別是南方包圍圈內的敵軍（即英軍），因其唯一之退路遭到切斷之故，拼命地嘗試突破，直到 20 日潰滅為止持續死鬥。」（第十五軍參謀部，1942）

（3）《緬甸作戰經過概要》之三：20 日晨擊退「重慶軍」新三十八師

其後，該報告又稱二一四聯隊「自 20 日早晨又將配屬戰車的新來之敵約 1,000 人（重慶軍新編第三十八師有參加）予以重大損害，並將之向東北方擊退」（第十五軍參謀部，1942）。

對照中英日三方記載，不難發現第十五軍編纂的《緬甸作戰經過概要》有自我膨脹與誇大，更有將己方部隊的行動修改、省略，對方部隊結構也不願提及的現象。因此造成在仁安羌戰役關鍵時刻的許多紀錄，與盟軍方面出入甚多的現象。不僅前述 17 日國軍新三十八師第一一三團協同英軍裝甲部隊進行解圍作戰的部分未能明記國軍參戰單位番號，也未能記載國軍一一三團 18 日休兵，與 19 日發動解圍作戰的詳細時間。倒是對二一四聯隊攻佔油田區的時間紀錄明確。

到了 20 日盟軍解圍成功，撤出仁安羌時才註明當天接戰的敵軍中包括新三十八師，甚至還刻意描寫成包圍圈內英軍潰滅、新三十八師救援不成，反遭日軍擊退，以營造二一四聯隊苦戰獲勝的形象。

2. 日軍檔案中的國軍解圍時間矛盾與真相

倘若吾人再參考同樣保存於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資料中心的《第三十三師團略歷》，將會發現日方自身的作戰記錄間亦有各說各話之處。

（1）《第三十三師團略歷》

在該檔案中作間部隊宣稱於 19 日夜間突入仁安羌並「佔領之」，然而卻遭到來自周圍敵軍的「熾烈反擊」，並受到來自東北方獲得戰車伴隨之有力敵軍攻擊（此處日軍又再一次不提該部隊主力就是一一三團），導致（日軍）部隊「陷入苦戰、戰況陷於渾沌」（第三十三師團，1945）。

《第三十三師團略歷》稱 19 日夜間才佔領仁安羌的記載，應該是指仁安羌鎮區，而《緬甸作戰經過概要》宣稱於 17 日佔領的「仁安羌」主要是指油田地帶。然而，《第三十三師團略歷》又進一步宣稱「19 日夜間」因盟軍反擊，導致作間部隊「陷入苦戰、戰況陷於渾沌」之說，卻不見於《緬甸作戰經過概要》的記載。

其實，《第三十三師團略歷》中稱「盟軍反擊」導致日軍「陷入苦戰」時間的 19 日「夜間」頗有玄機。如不對照日軍其他作戰檔案，可能會以為此處的「夜間」是指 19 日太陽西下之後至 20 日凌晨之間。

（2）獨立工兵第二十六聯隊第二中隊的逐日戰鬥命令

解開第十五軍與第三十三師團紀錄誤差之謎的關鍵，可能不在師團或軍等高層單位的文件，而是在基層部隊的相關逐日命令、紀錄上。事實上，上緬甸作戰期間，配屬第三十三師團獨立工兵第二十六聯隊第二中隊留下了支援仁安羌戰役的戰鬥詳報。

該聯隊原為船舶工兵改編而來，在緬甸作戰中肩負利用所屬的運輸船隻與汽艇，載運部隊與運補的後勤任務。但在仁安羌戰役期間二十六聯隊曾載運原部署於第三十三師團右翼，但轉移至該師團左翼的第二一五聯隊（又稱原田部隊），沿伊洛瓦底江溯流而上，增援仁安羌（獨立工兵第二十六聯隊第二中隊，1942）。在這段期間，該聯隊幾乎每天都會發布作戰命令給所屬各部隊，而命令的開頭中，一定會報告前線戰況，以供下屬各單位對戰局有基本認知。

逐條比對 4 月 18 日到 20 日間獨立工兵第二十六聯隊第二中隊所保留的部隊命令與《第三十三師團略歷》來看，就可發現師團略歷記載的 19 日「夜間」大有問題。因為第二十六聯隊第二中隊在 4 月 18 日 2100 時所發佈的中隊命令中還提及「敵軍正頑強抵抗我軍從仁安羌東南及東北兩側殲滅的企圖」，而到了 24 小時後的 19 日 2100 時該中隊接獲的獨立工兵第二十六聯隊命令中，周遭戰況的通報就成了「師團的作戰朝有利方向進展，馬圭、仁安羌附近之敵軍大致掃蕩完畢」（獨立工兵第二十六聯隊第二中隊，1942）。

（3）真相之勾勒

從參與仁安羌戰役的日軍基層部隊逐日命令中，反而揭露了第十五軍、第三十三師團高參在戰役結束後編寫作戰紀錄時曖昧不清的真相——那就是《第三十三師團略歷》宣稱 19 日「夜間」的盟軍反擊，恐怕是指 18 至 19 日清晨之間，但為了要隱去日軍攻佔仁安羌鎮區時，盟軍早已解圍成功、撤出當地的事實（也就是日軍戰術上的挫敗），只好以隱晦的手法巧加彌補，營造皇軍突破強敵頑抗，成功攻佔目標的形象。

若此推測屬實，則國軍隨軍史官孫克剛所著《緬甸蕩寇志》記載稱「19 日東方魚肚白色還沒出現，攻擊便開始了」的說法（孫克剛，1946: 8），便有日方作戰檔案的證據相呼應了。至於第十五軍的《緬甸作戰經過概要》，偏離第一線的實際戰況更大，在解讀上更須注意。

（四）緬甸擾亂軍在仁安羌戰役中的實際作用

綜合以上說法可知：〈南機關對緬工作報告〉證實了仁安羌戰役中確有緬甸獨立軍所屬「擾亂軍」出沒。因為費派粹（Gerald Fitzpatrick）也見證確有兩個穿傳統緬服的緬人在現場引導日軍（Fitzpatrick, 2001: 183）。⁴⁰〈南機關對緬工作報告〉繼稱擾亂軍「因敵軍兵力強大，無法搶先於日軍之前佔領當地」等語，過於簡略。判斷擾亂軍在仁安羌時，不僅當地有日軍正規部隊的第三十三師團二一四聯隊及二一三聯隊（後者於 17 日佔領馬圭，19 日抵達仁安羌南方）所包圍，華軍新三十八師一一三團也對包圍圈發動解圍戰，並於 19 日下午成功解圍，當天所大量殲滅的「日軍」，其實多是擾亂軍。⁴¹

費派粹的回憶錄提到仁安羌戰役期間，他本人參與戰鬥（Fitzpatrick, 2001: 171-191）。*No Mandalay, No Maymyo (79 Survive)*一書提到約 15 名英軍遭砍死，並丟棄於 3 部救護車內，直至 4 月 20 日清晨才被他們發現。他說（Fitzpatrick, 2001: 191；當時戰況請詳見圖 3）：

⁴⁰ 費派粹另出版 *Chinese Save British in Burma (Battle of Yenangyaung)* 一書，內容較無關，惟亦可參考。此外，尚有朱泓源、蕭明禮、楊力明、林天順之〈從國際政治重建中日仁安羌之戰（1942）實況〉論文稿可供參照（Fitzpatrick, 2014；朱泓源、蕭明禮、楊力明、林天順，2017: 2）。

⁴¹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也明言擾亂軍在該地遭遇「大失敗」（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1997: 627-628）。

救護車內五個人被斷頭與亂刀砍殺，狀似緬刀所為，有熟悉的屍臭味。每部救護車內故事相同，屍體都堆滿了。⁴²



圖 3、費派粹所繪製的七十年後仁安羌戰地的目睹回想圖

資料來源：Fitzpatrick (2001: 184)。

說明：作者依據費派粹所繪製的原圖，加上中文說明，並指出其誤植（501 高地為 512 高地）之處。

⁴² 原文：Five men inside the ambulance were mutilated and hacked, as though with Burman dahs, and there was the familiar stench of death. It was the same story with each of the ambulances, all were full.

緬甸密支那大學講師久綏寧博士告知（2015.07.22 訪談），此種死狀係緬刀而非刺刀所殺。然則該事件顯係緬甸獨立軍所為。另外，現地高溫竟到達華氏 126 度，相當於攝氏 48 度。見證到現場油汙滿天、幾乎天旋地轉，大家都熱昏頭，因此一團混亂的現象。也因此，故有日機來轟炸，卻錯炸日軍的插曲（Fitzpatrick, 2001: 183）。當然更進一步證明費派粹也有熱昏頭，因此把國軍與「日軍」浴血大戰，並大量殺死「日軍」，使費派粹驚華軍為神兵天降，不怕死地衝鋒陷陣，且槍法極準的 501 高地的部分搞錯為 512 高地的現象。

綜合上述史料的蛛絲馬跡，吾人判斷：由於擾亂軍進入仁安羌戰場時，正是孫立人領導中英兩軍進行解圍戰的高潮階段，而且他們已經回到緬甸，又隨日軍，甚至引領日軍北上（請見圖 2），故不能排除緬甸擾亂軍穿上日軍制服，與日軍聯手對付盟軍，結果在 18 與 19 兩日折損甚鉅。18 日當天，113 團所報告解救被圍困英軍數百人之仗，擊斃了「日軍」400 人（Stilwell, 1941-1945；盧潔峰，2015: 189）。19 日之戰，假扮「日軍」的擾亂軍又犧牲更重。在與盟軍部隊混戰之中，擾亂軍也有擊斃，或趁亂偷襲落單之盟軍，或下手殘殺傷兵的可能。而擾亂軍穿上日軍制服，混成日軍，並與華軍作戰但是因為訓練不足，故被華軍、英軍以及許多隨行人員與記者誤以為所大量殲滅的，都是日本正規部隊，故在大勝之後，這些洋人非常興奮，會以華語喊出「中國萬萬歲」口號（Belden, 1944: 164）。⁴³

果如此，則孫立人將軍所領導的新三十八師兩個團，以及英軍的聯合作戰，加上英緬第一師的趁機回擊，例如費派粹上尉與同袍 Bareham 的成功狙擊站在兩座鑿井臺上擔任瞭望及旗語工作的「日軍」兩名信號兵，使攻入油田區的所謂「日軍」全部陷入迷失方向，再加上天昏地熱，氣溫極為燠熱等等的作戰（Fitzpatrick, 2001: 187），自然產生巨大功效，故能殲滅一千多名的「日軍」。

由此，吾人亦可進一步確認：國軍在仁安羌戰役中所遭遇的「日軍」之中，有相當部分實為緬甸擾亂軍。可惜日軍的戰報也隱晦掉了。

⁴³ 隨行人員群中，有美國人 Jack Belden 等外國記者，是會華語的。

（五）附論：臺灣人參戰亦遭隱晦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緬甸獨立軍參與仁安羌戰役中的實情在日軍檔案中多遭隱晦。除此之外，曾經與日軍訓練緬甸「三十志士」有密切關係的臺灣，亦有臺灣人參與了 1942 年緬甸戰役，卻同樣遭到日軍的隱晦。但是，根據寫實小說家葉石濤的一部小說〈俘虜〉，就點出日軍侵緬當年，臺灣人配合著緬甸三十志士以及緬甸獨立軍，混在日軍當中服役的故事（葉石濤，2006: 51-52）。小說中提到的臺灣軍七二〇三獨立自動車部隊的駕駛後宮伍長是其中之一。他 1942 年曾經跟著侵緬日軍，自南緬登陸之後，在翁山領導的緬甸獨立軍領路之下，長驅直入，北上追擊華軍數萬里。⁴⁴

昔年臺灣人參與日軍征緬者所在多有。今天的緬甸華僑華人，也是緬甸僑教的第一領導人吳中庸董事長，但是沒有幾個人知道他也是當年參與侵緬的臺籍日本兵。⁴⁵

六、結論

本文作者們與其研究團隊，原為研究中日大戰在緬甸，卻無意間發現竟與臺灣關係密切。透過考證、調查與中、美、英、日文史料比對，追蹤日本為侵略緬甸而動用情報機構，在臺扶植其反英份子組成的「緬甸獨立軍」，探討臺灣對東南亞地緣政治之戰略地位，兼論獨立軍在緬甸仁安羌戰役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全文首提臺灣與緬戰的關係，其次提供釐清仁安羌之役真相的部分線索。

發現日本發動侵緬，最重要的手段，自以結合緬甸菁英，使動員緬甸社會，在當地直接推倒英政府、擊敗英軍最為上策。至於華軍的南下，且更須直接加以殲滅。如此一來，除扼住中國咽喉，使之窒息以外，又將其新培育的精銳戰力一舉擊潰。為達成此一目的，除了需爭取緬甸境內反英份子的支持之外，更需要實際培植這些反對勢力，加以武裝。

這時，位處戰前日本帝國勢力圈南端，與中國大陸華南地區、東南

⁴⁴ 描寫 1945 年 8 月發生在臺灣軍七二〇三獨立自動車部隊，奉命執行作戰命令第一五二號，監管的盟軍戰俘與日軍看守者之間的故事，其中一名司機說出曾在緬甸開車數萬公里。

⁴⁵ 詳情請參閱朱泓源（2019）。

亞地緣相近的臺灣，被充分利用，成為訓練翁山等「三十志士」的基地之一。並特別成立南機關，透過臺灣取得需要的武器裝備，集結訓練上述人員，以及開赴緬甸戰線，甚至臺灣人也一道出征。而這些反英份子在臺受訓、日本駐臺之臺灣軍從中協助，正好與1930年代末期臺灣在日本南進政策中發揮「南進基地」的作用相合。當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發動緬甸作戰之際，在在彰顯了臺灣與東南亞的地緣戰略關係。

本文進一步探究緬甸獨立軍作為第五縱隊的性質：日軍在進攻緬甸時，常運用該部充當擾亂盟軍後方，從事滲透、破壞乃至政治作戰的特種任務。為了奪取上緬甸重要的油田地帶，執行對緬謀略工作的南機關，賦予了緬甸獨立軍所屬的擾亂軍迅速攻佔仁安羌的任務。本文又運用日軍第十五軍、三十三師團、國軍新三十八師一一三團、英緬第一師、英國裝甲及砲兵部隊之交戰史料，除建構各國將校領導的細部，與彼此溝通管道等問題外，重新建構緬甸獨立軍在仁安羌戰役期間所產生的作用，置入盟軍與日軍數度交火的脈絡中，具體發現獨立軍才能扮演之殺人手法。並以之為基礎證明獨立軍存在與引導日軍作戰的事實，從而更進一步地解決了仁安羌專家盧潔峰以校勘手法，在所著《仁安羌解圍戰考》中對孫立人師長與劉放吾團長誇大戰果的質疑。因為，日軍所報陣亡人數，當然不能把獨立軍陣亡者算入。

要之，透過本文的分析考證，再次證實日本軍諜報機構的「南機關」，與日治時期駐防臺灣的「臺灣軍」部隊共同合作，訓練緬甸的「三十志士」，成為日後緬甸獨立軍的核心成員，並在日軍入侵緬甸時滲透至緬境各地，以暗殺、破壞、製造假情報，同時也參與仁安羌野戰之真相，以及臺灣軍亦參與緬戰也有蛛絲馬跡。顯見臺灣軍與緬甸獨立軍也有戰術上的合作關係。

進而重看第一手的戰史舊檔案，依時序比對，而有日軍雖然確實借緬人之「刀」⁴⁶殺華人、英人等等，但在報告中隱晦不承認的嶄新發現。⁴⁷臺灣參與日本侵入緬甸（1940-1942）之故事，秘而不宣已七十多年，也因此而意外地初見天日。

⁴⁶ 此刀字係雙關語：一指緬刀（dahs），一指日軍利用緬人與臺人混入日軍，來殺盟軍。

⁴⁷ 臺人參與緬戰部分，仍待詳查。

參考文獻

• 中文

- eTaiwan。2011。〈日治時期的臺灣軍事指揮中心——臺灣軍司令部〉，
<http://etaiwan.pixnet.net/blog/post/84226318>
- 中村孝志。2002。《日本南進政策與臺灣》（日本の南方関与と台湾）
（卞鳳奎譯）。臺北：稻鄉出版社。
-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1997。《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
甸攻略作戰》（戰史叢書：ビルマ攻略作戰）（曾清貴譯）。臺北：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王文隆。2019。〈抗戰期間中泰軍事上的衝突與秘密往來〉。《國史館館
刊》，59: 1-26。
- 王文燮。2015。《中國抗日戰爭真相》（增修版）。臺北：中華戰略學會。
臺灣電廠百年文史地圖。2018。〈玉里火力發電所〉，[http://map.net.tw/
taipower/item/011/](http://map.net.tw/taipower/item/011/)
- 朱宏源。2019。〈再論中日首戰緬甸與華僑華人〉。淡江大學主辦：「2019
年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6月21日至22日。
- 朱宏源、蕭明禮、姚敏芝。2015。〈緬甸建國者與臺灣 上：二戰初期 1939-
1942〉，鄭德美主編：《「戰爭與和平——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
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95-334。桃園：國防大學。
- 朱宏源、蕭明禮、楊力明、林天順。2017。〈從國際政治重建中日仁安羌
之戰（1942）實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邁向和解之
路：中日戰爭的再檢討國際學術研討會」，9月13-15日。
- 何敏。1979。《夢影遊痕》。臺北：中外雜誌社。
- 李君山。2012。〈抗戰時期西南運輸的發展與困境——以滇緬公路為中
心的探討（1938-1942）〉。《國史館館刊》，33: 57-88。
- 林蔚。1943。〈緬甸戰役得失評判〉（三）。《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
數位典藏號：001-072620-00003-001。
- 孫克剛。1946。《緬甸蕩寇志》。出版地不詳：國際圖書出版社。
- 記憶·臺北。2007。〈婦聯總會〉，[http://blog.xuite.net/liangcw/
blog/12538346](http://blog.xuite.net/liangcw/blog/12538346)

- 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編。2013。《臺灣近代戰爭研討會論文輯》。
高雄：春暉出版。
- 張鑄勳。2015。《抗日戰爭是怎麼打贏的：紀念黃埔建校建軍 90 週年論文集》。桃園：國防大學。
- 梁華璜。2003。《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導論》。臺北：稻鄉出版社。
- 陳中和。2013。〈從華僑、華人到馬來亞人：梁宇皋認同轉變的生命歷程〉。何啟良編：《百年尋繹：馬新歷史人物研究》，頁 19-85。吉隆坡：拉曼大學中華研究中心。
- 陳慈玉。1997。《初論日本南進政策下臺灣與東南亞的經濟關係》。臺北：中央研究院。
- 楊競編著。2014。《日本盟軍戰俘營》。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葉石濤。2006。《葉石濤全集》。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
- 葉碧苓。2010。《學術先鋒—臺北帝國大學與日本南進政策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
- 璞石閣。2017。〈玉里分屯中隊內景〉，<https://www.tipga.com/e/58dac0893286fe16a514a56d>
- 。2020。「愛上璞石閣」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i3posiko/>
- 盧潔峰。2013。《仁安羌解圍戰考》。廣州：編者自版。
- 。2015。《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 鍾淑敏。2004。〈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34: 149-194。
- 蘇芷萱。2008。〈國史館臺北辦公室—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的建築〉，《國史館館訊》，1: 144-161。

・日文

- 久我成美（蘭貢〔仰光〕領事）。1939。〈緬甸二到着セル支那向武器二關スル第二中間報告〉。《壹大日記昭和十四年七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檔案（陸軍省-壹大日記-S14-2-210）。
- 中野校友會編。1978。《陸軍中野学校》。東京：原書房。

- 立川京一。1999。〈戦時下仏印におけるフランスの対日協力——一九四〇～四五年〉。《防衛研究所戦史部年報》，2: 41-56。
- 武島良成。2001。〈南機関小稿〉。《東南アジア研究》，38(4): 588-600。
- 河林原直人。2009。〈植民地台湾の財界構成：1941 年を中心に〉。《名古屋学院大学論集 社会科学篇》，45(4): 129-169。
- 南方軍總司令部。1942。〈緬甸工作二關スル件報告〉。《昭和十七年陸亞密大日記 第四十二號 2/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檔案（陸軍省-陸亞密大日記-S17-110-222）。
- 泉谷達郎。1989。《ビルマ独立秘史——その名は南機関》。東京：徳間書店。
- 畠山清行。1967。《続・陸軍中野学校》。東京：サンケイ新聞出版局。
- 第一復員局。1949。《緬甸作戰紀錄 第一期》。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檔案（南西-ビルマ-388）。
- 第十五軍參謀部。1942。《緬甸作戰經過の概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檔案（南西-ビルマ-30）。
- 第三十三師團。1945。《第三十三師團略歴（編成—支那—緬甸—インパール作戰—泰國への轉進）》，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檔案（南西-ビルマ-123）。
- 陸軍省兵器局銃砲課。1941。〈南機関交付兵器二關スル件〉。《昭和十六年陸支密大日記 第六十三號 1/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檔案（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6-160-183）。
- 溝口郁夫編。2012。《秘録・ビルマ独立と日本人參謀——野田毅ビルマ陣中日記》。東京：國書刊行會。
- 綠川巡。1998。《幻のビルマ独立軍始末記》。東京：文藝書房。
- 遠藤順子。2003。《ビルマ独立に命をかけた男たち》。東京：PHP 研究所。
- 徳田忠成。2008。〈陸軍直轄の航空輸送部隊〉，<http://www.aero.or.jp/web-koku-to-bunka/2008.05.15youseijo15.htm>
- 緬甸国軍事顧問部。1944。《南機関外史》，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檔案（南西-ビルマ-43，極密檔案）。

横田武郎。1936。《暹羅糖業視察報告書》。臺南：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

澤田廉三（外務次官）。1939。〈海防經由蔣政權の貿易に関する件〉。《壹大日記昭和十四年七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檔案（陸軍省-壹大日記-S14-2-210）。

獨立工兵第二十六聯隊第二中隊。1942。〈「エナンジョン」附近における原田部隊揚陸作業計画 昭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1）〉。《第三十三師団「マグエ」「エナンジョン」攻略水路戦闘詳報 昭和一七・四・一一一七・四・二》，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檔案（南西-ビルマ-237）。

蕭明禮。2017。〈日中戦争前期における日本軍の華南沿岸に対する海運封鎖——珠江デルタを中心に（1938）〉。《華南研究》，3:31-54。

齋藤充功、坂茂樹。2015。《陸軍中野学校極秘レポート》。東京：笠倉出版社。

・其他

Allen, Louis. 2000. *Burma: The Longest War: 1941~1945*. London: Phoenix Press.

Belden, Jack, 1944. *Retreat with Stilwell*. Garden City, New York: Blue Ribbon Books.

Bo Min Khaung. 1968. *Bogyoke Aung San and Thirty Comrades*. Rangoon: Shwe-Tu Publishing House. (In Burmese)

Fitzpatrick, Gerald. 2001. *No Mandalay, No Maymyo (79 Survive)*. Sussex, England: The Book Guild Ltd.

_____. 2014. *Chinese Save British in Burma (Battle of Yenangyaung)*. Leeds: York Publishing Services.

Slim, William, 1956. *Defeat into Victory*. London: Cassell.

Stilwell, Joseph W. 1941-1945. *The World War II Diaries of General Joseph W. Stilwell (1941-1945)*.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Japan's Invasion of Burma (1940–42) and the Role of Taiwan

Ming-Li Hsiao

Adjunct Lecturer, Faculty of Global Studies, Musashino University, Japan

Hong-Yuan Chu

Adjunc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Colonial Taiwan was instrumental in Japan's success in invading Burma (1940–42) during World War II. A Japanese spy organization, Minami Kikan, planned in 1940 to use Taiwan as a base to train the Burmese "Thirty Comrades", putting the plan into action the following year. After the War in the Pacific Ocean broke out, the Kikan deployed the Comrades to guide and fight alongside Japanese troops in their Burmese homeland. Led by the Kikan, the Comrades formed the nucleus of the Burmese Independence Army (BIA), and the Japanese provided them with reinforcements and supplies, asking them to fight alongside their fellow Burmese against the Allies in Burma.

In the famous Battle of Yenaungyaung in April 1942, the BIA also fought, wearing Japanese uniforms. While the battle was ultimately a victory for Japan, the BIA's participation with great casualties has nevertheless been neglected in the academic world for a long time, until now.

This study not only explores the role that Taiwan played in the Japanese training of these Burmese leaders, but also uncovers the lost story of Burmese participation in this battle in central Burma between troops of Japan (with BIA) on one side, and the U.K., R.O.C. and U.S.A. on the other.

Key words: World War II, Taiwan, Myanmar, Burmese Independence Army (BIA), Minami Kikan, Yenangyaung Battle